

汉文训读符号与敦煌文献关系考

南京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赵熠玮

[摘要] 古代汉字文献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国家被称为“汉文”。而汉文训读则是在古代汉字文献上施以特殊训点符号,使未习得汉语之人亦可理解汉语书面语的一种文化翻译处理方式。对于汉文训读的起源,一般有日本起源说、源自朝鲜半岛说、源自我国敦煌文献说三种假说。目前三种假说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同时均缺乏足够的证据。通过对现存敦煌文献中的特殊符号的整理与现存江户时期日文训读文献所见符号的对比,进一步从实证角度佐证汉文训读与敦煌文献之间的密切联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对周边国家文化进程发展起到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 汉文训读 文化遗产 敦煌 角笔

1 汉文训读研究的现状

语言文字是思想传播的最重要载体。历史上我国思想文化的广域传播主要手段即为汉字文献。这些古代汉字文献在邻近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汉字圈国家被称为“汉文”。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汉文是我周边诸国对吸收大陆先进文化的唯一媒介。在使用汉文的过程中,各国都出现了一种相似的读解方式——汉文训读。通过这一独特的文化翻译技法,以不改变古汉语文本而只添加训读符号的方式,大量吸收了汉文文献。随着朝鲜半岛的脱汉字运动的进行,汉文训读在这一地区基本已经消失。但是在仍使用汉字的日本,汉文文献被视为其本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文训读教育依然是该国高中国语教育的重要一环,成为了研究该国以及我国古典文化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输出这一课题时,宝贵的研究对象之一。

日本的汉文训读作为一种翻译工具,自奈良、

平安时代就已产生^[1],并随着佛教东传被大量使用在汉传文献的译注上。我国宋代以后,大量儒家四书学典籍对外传播后经过当地本土化吸收形成了“域外四书学”这一学问体系。其中,日本四书学的兴起与发展主要集中在江户时期(1603-1867),故又称江户四书学。汉文训读因江户四书学得以再次兴盛。到德川幕府时期,已经形成了文之点、道春点、一斋点三大训读符号体系。而江户时期各主要儒学流派均运用这类训读符号,根据其自身理解对中国的“四书”典籍(《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作出注释。但因日本儒者并非以汉语为母语,绝大部分儒者甚至不懂汉语,因此日语汉文训读体系实质是一种文化翻译技法。其阅读时将古汉语书面语文本通过增加返点与送假名加工成日语的「書き下し文」,而书写时又将「書き下し文」复原成汉文。这一语言形式在前近代日本思想文化世界中发挥着阅读、理解、表达以及广域沟通的重要作用。基于汉文训读体系的文化解读不仅成为日本社会性知识的基础,也成为了其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重要工具。经过训读返点标注的古汉语文献,无论是纯汉文抑或是变体汉

文,一般已经不被看作是汉语,而是古典日语的一种表现形式^[2]。

对于汉文训读史的研究,早期文献可以追溯到日本江户时期著名儒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的《译文筌蹄》。他虽然对汉文训读这一文化翻译技法本身持批判态度——认为学习汉文文献首先要掌握古汉语,并使用所谓唐音「音讀」去理解文献。但与此同时,又对古汉语实词、虚词的运用以及训诂方法做了整理和说明。其后又通过对四书注释的实践,证明了字词训诂和训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明治维新之后,山田孝雄博士(1873-1958)从日本国文学的角度对汉文训读做了详细的解读。山田博士认为汉文训读不仅仅对近现代日语,甚至对长期被看作是日本独特文化的古典文学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3]。但同时其也认为汉语训读起源基本已不可考。而小林芳规博士(1929-)则指出汉文训读对《万叶集》诞生产生了直接影响^[4]。而《万叶集》以及由其产生的万叶假名则一般被认为是日本假名字的起源。由此可见汉文训读对日本语言形成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但是小林博士也未完整地阐述汉文训读的起源。

在韩国,主推汉文训读朝鲜半岛起源说的学者众多。近年来,金文京教授的研究从佛经汉译角度进一步强化了汉文训读起源于朝鲜半岛的假说^[5]。尤其是其关注到了韩国近世训点资料与日本训点资料中的异同关系^[6]。

Indra Levy, Aldridge Edith等欧美学者也关注到了汉文训读这一独特的文化翻译工具,但他们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将其作为古代东亚书面语之间的独特交流方式进行考察,成果较少。对汉文训读起源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

而在我国,关于汉文训读的先前研究相对较少,尚处于对汉文训读规则与汉字论的梳理阶段。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者而言,与周边汉字文化圈国家学者不同,长期以来无需通过汉文训读去理解古汉语文献,因此对训读文献和汉文训读法必要性的认识与日韩研究者有较大的差异。但部分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到汉文训读作为一

种文化翻译对日本古典文学甚至词汇演变的影响^[7]。同时另有部分学者特别关注了汉文训读与日本汉诗之间的关系^[8]。在为数不多的汉文训读文献研究中,王晓平教授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其以《文馆词林》为代表,将唐代文学写本的东传与日本奈良及平安时代初期写本相比较并考察了其存在的相关性,并认为这些写本的东传诱发了敕撰文集、释奠文学的诞生与宫廷“文场”的出现,推动了以文为礼、以文为政、以文为教、以文为戏为的“人文”观念的形成。并指出在东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汉文写本对于各民族文化传播与传承曾经发挥过不可代替的作用^[9]。同时,王晓平还进一步探讨了作为文化翻译的汉文训读对当地民族文字发展所起的作用。其借鉴了敦煌俗字研究的方法,对今本《今昔物语集》中保留的俗字及对其考释中的误读误释加以匡正。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今昔物语集》可以为敦煌研究和日本汉字研究之间架设一座沟通的桥梁^[10]。同时,其认为敦煌文献的发现,为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考察《千字文李暹注》和《孔子项托相问书》在《万叶集》汉文种的影响,利用敦煌学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对《万叶集》中某些存在疑义的训释提出新见,指出了敦煌文献对于奈良时代文学和东亚文化与文学交流研究的深化具有独特的价值^[11]。

实际上,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对汉文训读起源的考察可以梳理出汉文文献在东亚广域传播的路径和过程,对历史上我国对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文化输出史料加入的研究也有极大裨益。

2 汉文训读起源假说

目前学界对汉文训读的起源有三种主要假说,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起源于日本本土说。春日政治博士在其论文『初期点法例——聖語藏点本を資料として』中认为训读起源于日本平安时代初期,出自南都古宗(奈良)的僧侣之手^[12]。这一学说还被收入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刊行的『国語学大辞典』,

成为日本学界的通识。

第二、起源于中国大陆楼兰、敦煌文献说。石塚晴通氏在其论文『楼蘭・敦煌の加点本』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13]。后又在其著作『日本学・敦煌学・漢文訓読の新展開』中进一步详细论证了自身观点,并强调了受敦煌文献影响下的汉文训读对日本文学和思想史发展过程的影响作用^[1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对江户思想史发展影响深远。

第三种是朝鲜半岛影响说。藤本幸夫氏在其论文中阐述了公元八世纪,新罗留学僧与日本华严宗僧侣共同创造了汉文训读法的可能性^[15]。近年来,因在新罗以及高丽出土的经卷史料中发现了角笔(一种古代书写工具)加点,而使该学说广受关注。

对于以上三点假说、分别有如下问题点尚待解决。

其一、起源于日本说是因春日博士早期考证了在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圣语藏所保存的朱白点古经卷而得出的结论。但其论证局限于圣语藏点本这一单一史料,学界一直有对其全面性的疑问。与此同时,因后期角笔文献的考古发现,该研究已经被证实是不甚准确的。汉文训读的起源最起码要上溯至奈良时期,而非春日博士所称的平安时代初期。

其二、起源于敦煌文献说的根据是石塚晴通氏发现了敦煌文献中以朱点注释的破音字点。但无论是奈良时代的角笔文献还是平安时期的朱白点文献中均未发现类似用例。因此缺乏说明起源于敦煌文献的有力证明。敦煌文献作为汉文训读起源的一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还待进一步验证。

而对于第三种假说,藤本幸夫是根据“语顺符”来判断的。这一用以体现训读顺序的符号大量出现在十五世纪后半叶朝鲜半岛的文献资料中。而在日本、除了源自新罗的文献以外并未采用此种标记方式。因此,如果说汉文训读是受朝鲜半岛影响下产生的则尚缺乏文献考证的支撑。

本文在吸取以上各种假说的基础上对现存可以考证的敦煌文献加以整理并与现存日语汉文训

读符号对比,以期对敦煌文献在汉文训读形成过程的影响作出补充。

3 现存训读符号

汉文训读遵循的是古代书面语的基本语法。在古汉语的基本语序上施加提示阅读顺序的符号(即训点)以满足日本人阅读的需要。众所周知,无论古典日语还是当代日语,都是以“主+宾+谓”为基本语序。而汉语则是以“主+谓+宾”为基本语序。因此,训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调整古汉语语序这一现实问题。这一类符号被称为“返点”。根据语法结构层次的繁简,使用「レ」点来反转单字,以「一二三」点、「上中下」点、「天地人」点等来反转词汇和短语。

其次,日语作为粘着语,大量使用只具有语法功能的助词,例如「て」「に」「を」「は」来连接不同的语法成分。而汉语并不存在这一类助词。因此在训点文献中经常以小文字夹注的方式添加日语助词。同时汉语中又有大量日语中不存在的虚词,例如“了”“着”“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文训读体系中出现了送假名,以虚词实化的方式处理这一类虚词。如上述三个词分别读成「しまう」「つける」「おける」。

经过以上两种方式处理后,古代日本人即便

原文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训点汉文	有 _レ 朋自 _二 遠方 _一 來、不 _レ 亦樂乎。
训读「書き下し」	朋有り遠方自り来たり、亦た樂ばずや。

注:作者编制。

图1 训点汉文与「書き下し文」

不翻译原文,依然可以达到理解古汉语书面语的目的。比如,以《论语》学而篇为例。

从上例图1可以看出,「レ」点颠倒了「有」和「朋」的单字顺序,使宾语前置。而「一二」点则颠倒了「遠方」这一双字词汇与介词「自」的顺序,使汉语介宾短语的结构符合日语语法。同样「樂」与「不」的顺序倒置后使否定助词被置于文末,满足了日语语法的基本要求。

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这一汉字否定助词变为假名否定词「ず」,日语中不存在的虚词「乎」则直接被省略。

除这两类常用返点之外还有连接字与字使其组成双汉字词汇,避免误读的符号“-”,在文字边打旁线以便在页面上方作出注释的注释符号,以及在文字本身划线以删除文字的删除符号与在文字间小字补充内容的插入符号。通过这样的加工,大体上就变成类似图2(古义堂本伊藤仁斋《语

孟字义》,1714年)的形式。即便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汉文本身的语气或者说字里行间所渗透出的一些非文字的部分,但却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保留了大意。同时,因为训点并不改变原文,所以阅读者如果思考后发现有不正确的地方也可以自行修正。这比起没有原文参考而全盘依赖译文的翻译体来说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

不仅仅是在阅读我国的古文献时使用训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也长期将汉文作为官方标准书面语来使用,这被称为和制汉文。为了便于民众理解,亦会在和制汉文基础上增加返点^[16]。明治以汉文「書き下し文」为基础的汉文调则成为标准书面语,比如福泽谕吉『学問のすすめ』。但无论是现存训点抑或是历史上存在的诸多种训点,目的都仅仅是为了将古汉语文献转变为符合日语语法的语序。因此本质上可以认为其仅仅是指示符号,与其形状和书写方式并无关系。

4 敦煌文献中出现的训点符号

我国自汉代以来就盛行训诂之学,这是与古籍整理实践相结合的一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学问,包括了“传”“注”“疏”“解”“释”等多种样式。最初只是为了解决汉字古今之“异”(汉代与先秦之异),以便阅读。而后则成为了借权威之言释自家之说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宋代,朱熹通过重新训诂四书的方式创立了一整套新的儒学体系。而中国的汉字文献在大规模传入日本后,同样需要解决“异”的问题。对于日本读者而言,不仅仅存在古今之异,更有日本本土语言与中国汉语之异。特别是日语本身是“主-宾-谓”结构,需要调整汉字语序以便阅读。早于儒家经典东传日本的是佛经,在日本奈良平安朝佛教盛行,自皇族而下公卿高层尊崇的现实需求下,解读佛经是汉文训读得以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因此早期的训读文献也均以佛经为主。无论从传播时期来看,还是从内容来看,敦煌文献都与日本汉文训读存在密切联系,这一点从现存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藏经书也可以得到佐证。



注:『語孟字義』(古义堂,1714)。

图2 典型日本汉文文本

在上世纪,我国敦煌考古发掘出的文献中有一类并不使用墨色,而是在纸面留下划出凹陷划痕的方式留下记录的文献。当时并未发现此类记录的使用工具,但经部分日本学者考证,认为其类似于日本一种被称为“角笔”的书写工具留下的痕迹。这在日本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17]。吉泽康和、藤田惠子、小田宽贵、中村俊夫于1993年到1994年分两次在大英博物馆及大英图书馆对馆藏敦煌文献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语言学家小林芳规氏也参加了这次研究,以期从敦煌文献中寻找角笔符号存在的规律。从两次考古研究中整理出的“类似角笔”文献如下:

第一次: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S797)、观音经(S5556)等7件

第二次:太公家教(S479)、维摩经义记卷第四(S2732)等9件

两次调研发现的“类似角笔”文献数量有限,因此在1996年,吉泽康和、藤田惠子、小林芳规等学者对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进行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考古考察。这次的敦煌文献里整理出的“类似角笔”文献数量繁多。本文在上述三次考古考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只取与汉文训读相关的符号,整理如下:

大英博物馆藏27件

1、摩诃般若波罗蜜品第四、一卷(S2925)

含角笔句切点、朱点、墨点

2、杂阿毘昙心经卷第六、一卷(S996)

含角笔句切点、朱点、墨点

3、胜鬘义记一卷、一卷(S2660)

含角笔句切点、朱点、墨点

4、太上业报因缘经卷第九、一页(S861)

含角笔句切点、朱点

5、观音量寿佛经一卷、一卷(S2537)

含角笔句切点、合并符号、朱点、墨点

6、梵网经菩萨戒序、一卷(S3206)

含角笔句切点、朱点

7、无量寿观经、一卷(S1515)

含角笔句切点、删除符号、朱点、墨点

8、菩萨戒本疏卷第六、一卷(S2500)

含角笔句切点、朱点、墨点

9、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宣演、一卷(S4052)

含角笔汉字、句切点、删除符号、插入符号、朱点

10大乘经纂要义、一卷(S3965)

含角笔句切点、朱点

11、四分尼戒本、一卷(S1167)

含角笔句切点

12、瑜伽师地论卷第二十八、一卷(S735)

含角笔句切点、注释符号、朱点

13、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一卷(S3927)

含角笔句切点、合并符号、注释符号、朱点

14、瑜伽师地论卷第五十五、五十六、一卷(S6483)

含角笔句切点、合并符号、注释符、朱点

15、四分戒本疏卷第一、一卷(S6604)

含角笔句切点、合并符号、注释符、删除符号、朱点、墨点

16、四分戒本疏卷第四、一卷(S6889)

含角笔句切点、注释符、朱点

17、维摩诘经卷上中下、一卷(S4153)

含角笔句切点、墨点

18、瑜伽论第三十一卷-三十四卷手记、一卷(S4011)

含角笔句切点、注释符、删除符号、朱点、墨点

19、佛说善恶因果经、一卷(S2077)

含角笔句切点、朱点

20、佛本行集经变文(佛名经纸背)、一卷(S548)

含角笔句切点、朱点

21、中论卷第二三四、一卷(S5663)

含角笔句切点、注释符、朱点、墨点

22、佛说父母恩重卷、一卷(S1907)

含角笔句切点、斜线符号、删除符号、朱点

23、三冬雪诗、散华乐赞文、一卷(S5572)

含角笔删除符号、朱点、墨点

24、佛名经卷第九、一卷(S5482)

含角笔句切点、删除符号、朱点

25、佛说阿弥陀经、一卷(S4057)

含角笔句切点

26、僧伽吒经卷第一、一卷(S4399)

含角笔句切点、注释符、朱点

27、死者随身衣裳棺本、一卷(S6251)

- 含角笔句切点、朱点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7件
- 28、老子道德经下、十戒经、一卷(P2347)
含角笔句切点、斜线、朱点、墨点
- 29、大乘稻竿经随听手镜记、一卷(P2208)
含角笔句切点、合并符号、朱点、墨点
- 30、大乘稻竿经随听手镜记、一卷(P2284)
含角笔句切点、合并符号、注释符号、颠倒符号、朱点、墨点
- 31、诸法无行经卷上、一卷(P2057)
含角笔汉字、句切点、注释符、插入符号、朱点
- 32、十地义疏卷第三、一卷(P2104)
含角笔汉字、句切点、合并符号、插入符号、朱点
- 33、诸星母陀罗尼经、一卷(P2282)
含角笔句切点、斜线、朱点、墨点
- 34、佛说楞伽经禅门悉谈章并序、一卷(P2212)
含角笔句切点、朱点

5 敦煌文献符号与训读符号运用实例比较

包括上述34件文献在内的绝大部分敦煌文献都含有朱点、墨点符号。而上述34件文献中则除了朱点、墨点以外还有类似角笔工具划出的凹凸符号,即“类似角笔符号”。这些“类似角笔”文献符号与日本现存汉文训读文献中的训读符号有高度相似性。作为基础性材料也未得到充分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对其“类似角笔符号”进行梳理,以说明其与日本汉文训读符号的关联。以下通过若干实例来考察其敦煌文献“类似角笔符号”与汉文训读符号之间的关系。

第一类:颠倒符号。

上述文献第30号中出现了颠倒符号。形似汉文训读符号的「レ」点。此处方便起见以「レ」标注如下。

声闻者从于善友而听闻已所证果レ获令他闻故

此处“果证”一词本是佛教常用语。谓果地之证悟。因果相对而言。在因位之修行曰因修,依因修而证果地曰果证。如唐代彦惊《大唐大慈恩

寺三藏法师序》中有文“剖析空、有,显别断、常,示之以因修,明之以果证,足以贻范当代,轨训将来。”而“证果”则指经过长期修行而悟入妙道。如唐代张鷟《朝野僉载》卷二中有文“禅师后证果,居於林虑山。”而30号文献显然取前例之意。此处显示出原文“证”与“果”两字次序颠倒,所以角笔划出颠倒符号「レ」以纠正。此处实例可以看出其与日语汉文训读返点实乃同种用法。而日本汉文训读体系中「レ」的使用最为频繁,也最具有代表性。

第二类:合并符号。

上述文献中多次出现了合并符号。如文献第5号、第13号、第14号、第15号、第29号、第31号、第32号。此合并符号形似汉文训读的字字连接符号「-」,此处方便起见以「-」标记如下。

第5号《观无量寿佛经中》:

七宝庄严宝地宝池宝树行-列

此处为避免与上文混淆,特地以「-」符号连接“行”与“列”两字,使其组成一个词。这与日语训读中的连接符极为相似。因古汉语存在大量单汉字词汇,如不使用连接符号则很有可能使双汉字词汇与前后文组成其他词汇,引起误读。从这点看,连接符号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样的例子在第29号文献《大乘稻竿经随听手镜记》里也有:

不相-为

此处的连接符「-」将“相”与“为”连接成一个词。避免误读为“不-相为”。

在第32号文献《十地义疏卷第三》中则有:

经论何-故不释者

这一例也显然是为了不误读为“经论何。故不释者”而采用连接符使“何故”成为一个词,便于读者理解为“经论,何故不释者”。

第三类:句切点。

除去上述两种常见符号外,句切点在敦煌角

笔文献中也非常普遍。此处以「·」符号示例如下。

第20号文献《佛本行经卷变文》中有：

此内及外更有诸妙理·
同居有伴侣日食·
王辱则·臣死·

如上文所示一般用以断句。而断句本身在日语汉文训读中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众所周知,我国早期古文献本无句点,需要阅读者自身根据语义加以判断。因而正确的断句本身就非常考验阅读者的积累和素养。而在日本的汉文文献中,施加句点自身也被看作读解汉文的重要方式。在日本汉文文献中,一般使用空心小圈来断句。而从敦煌文献可以看出,至少早在公元六世纪句切点就在我国被普遍运用。存在由我国经由佛教典籍传入日本的可能性。

第四类:注释符号。

旁线注释符号也是在敦煌文献中多次出现的符号。在上述文献中出现在第12号、第13号、第15号、第16号、第18号、第21号、第26号、第30号、第31号中。鉴于排版关系,此处以下划线示例。

第18号文献《瑜伽论第三十一卷-三十四卷手记》中有：

皆说言第二静
影响现前故

此二处皆有旁线

再如第26号文献《僧伽吒经卷第一》中有：

萨埵白佛言世尊大苦大苦
如转轮圣王主四天下

特别是后一句“如转轮圣王主四天下”的下划线部分显然是对其中四字作出注释。这一种技法在江户时期的汉籍中颇为常见。如伊藤仁斋著《论语古义》(东洋图书,1922年版),获生徂徕《论语征》(浪华/嘉贺屋善藏本,1812年),佐藤一斋《大学栏外书》(北海道帝国大学藏本,1845年)等

均可见相关符号。有的文献会在旁线文字边进一步用小文字作出注释。

第五类:插入符号与删除符号。

此类符号在文献中出现频率也非常高。在形式上插入符号以墨色写出需要添加的文字而用划痕做注。而删除符号就直接在文字上划痕勾消。

插入符号出现在文献第9号、第30号、第31号中。如第9号文献《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宣演》中有如下一例。此处插入符号以×代替

释经×者(×符号右有文字“文”)

在文献32号《十地义疏卷第三》也有一例

圣教隐×难可测(×符号右有文字“显”)

此二例都可以看出添加了符号右侧文字后其文意更为通顺,可推测其用法即为补充插入文字。

相对的还有一类删除符号出现在文献第7号、第9号、第15号、第18号、第22号、第23号、第24号中。例如第9号文献《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宣演》中有可见下文(此处删除符号以文字上画横线代替,文献中为文字上划痕)

众族之内法

此处“内”旁有小字“同”,可以推测此处是删除“内”字改为“同”字的符号。

此类插入删除符号自身虽然与汉文训读的阅读语序没有关系,但考虑到汉文训读本身是一种文化翻译,译者在训读文书过程中根据自身理解插入和删除部分文字以期校正亦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6 结 语

上述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各类“类似角笔符号”文献只是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的一小部分,通过对其整理,可以看出至少在公元6世纪,我国就已经开始使用特定的符号来调整校正文本。这一系列的符号用例文献同样是敦煌文化中非常有价值

的宝贵遗产。而这一符号文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东传向日本等周边汉字文化国家输出,并对日本、朝鲜半岛等周边地区解读汉字文献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虽然尚无法完全确定敦煌文献是日本汉文训读符号的唯一起源,但是通过本文的对比可以看出其高度的相似性。同时日本早期训读文献均为佛教典籍^[18],此显著特点也与敦煌文献的主要内容高度一致。因此可以合理推测敦煌文献在汉文训读符号起源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汉文训读作为域外汉学重要组成部分之江户四书学的方法论体系,长期以来受思想史研究界关注较少。而从语言学角度看,汉文训读也并非单纯的理论语言学研究范畴。日本学者对汉文训读的关注集中于起源的考察,主要是意图探究汉文训读对日本在东亚文化传承体系中的自我认识所起的作用。而我国学者对汉文训读的关注则尚有不足。汉文训读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翻译技法,在历史上令日本短时间内大量吸收汉语文献这一贡献十分显著。同时,因这一翻译技法并不需要译者掌握汉语,有意或无意的误读

散见在各类训读文献中,和刻本(日本国内出版的训点本)四书典籍正是汉文训读的产物,客观上成就了独特的江户四书注释思想体系。因此亟需对汉文训读体系下的和刻本四书注释做出全面梳理,揭示训读体系下的四书注释对其思想内涵的影响。事实上就笔者前期的研究而言,江户儒者对汉文有意为之的误训直接与部分日本儒学者的注疏思想体系形成密切的联系,如获生徂徕『論語微』中即通过断句训点的不同来形成朱注的实际性差异。

从学术价值而言,进一步考察汉文训读这一古老技法,有助于完善对日本四书注释方法论的研究,拓展了江户四书学的理论框架。从应用价值而言,汉文训读的研究成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对语言学和哲学交叉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也有助于对我国优秀历史文化走出去的文字载体功能做出新的认识。

[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汉文训读体系的日本江户时期四书注释研究》(项目编号:17CYY054)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赵熠玮]

注

- [1] 中村春作.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M].東京:勤勉出版,2008:10.
- [2] 小島毅.訓読から見直す東アジア[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4:126.
- [3] 山田孝雄.漢文訓讀と國文法[M].東京:明治書院,1934:4.
- [4] 小林芳規.平安鎌倉時代に於ける漢籍訓読の国語史的研究[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7:24.
- [5] 金文京.东亚汉文训读起源与佛经汉译之关系[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2):19.
- [6] 金文京.東アジア漢字圏の訓讀現象—日韓近世の加點資料[J].Kugyol Studies(KCI Accredited Journal),2001(8):279.
- [7] 王晓平.日本汉文学与文化翻译[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6.
- [8] 辛文.日本汉诗训读研究的价值与方法论前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77.
- [9] 王晓平.汉文古写本与中华文明的早期域外传播——以《文馆词林》为中心[A].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变化中的价值与秩序:中华文明国际传播论文与摘要集[C].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办公室,2017:1.
- [10] 王晓平.敦煌俗字研究方法对日本汉字研究的启示——《今昔物语集》讹别字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
- [11] 王晓平.敦煌文学文献与《万叶集》汉文考证[J].中国文化研究,2004(4):120.
- [12] 春日政治.初期点法例—聖語藏点本を資料として[M].京都:京都大学国文学会国語国文,1952:21.
- [13] 石塚晴通.楼蘭・敦煌の加點本[J].墨美(201),1970:2.
- [14] 石塚晴通.日本学・敦煌学・漢文訓読の新展開[M].東京:汲古書院,2005:38.
- [15] 藤本幸夫.朝鮮の文字文化[J].大修館書店月刊言語,2007(10):72.
- [16] 高島俊男.漢字と日本語[M].東京:講談社,2016:97.

- [17] 小林芳規. 平安時代の佛書に基づく漢文訓讀史の研究[M]. 東京: 汲古書院, 2011: 19.
[18] 松本光隆. 平安鎌倉時代漢文訓読語史料論[M]. 東京: 汲古書院, 2007: 26.

参考文献

- 郑阿财. 论敦煌文献展示的六朝隋唐注经学——以《毛诗音隐》为例[J]. 敦煌学辑刊, 2005(4).
姚尧. “去典故化”与典故词的意义演变[J]. 古汉语研究, 2015(2).
潘钧. 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金文京. 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M]. 東京: 岩波書店, 2010.
吉沢康和, 藤田恵子, 小田寛貴, 中村俊夫, 小林芳規. 角筆および和紙の加速器質量分析法による14C年代測定[J]. 考古学と自然科学(34), 1996.
Indra Levy. Modern Japan and the Trialectics of Translation[J]. Review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2008(20).
Aldridge Edith. Principles of Hentai Kanbun Word Order: Evidence from the Kojiki. Language Change in East Asia[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作者简介: 赵熠玮(1984—) 男 汉族 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日本文化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zhaoyiwei@njust.edu.cn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Kanbun–Kundoku and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 are known as "Kanbun" in Japan, Korea and Vietnam. Kanbun-Kundoku is a method to subjoin special punctuation marks to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 that allowed ancient Japanese to understand these documents even if they had not learned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There are three hypotheses on the origin of Kanbun-Kundoku: origins from Japan,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or from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But all of these three hypotheses lack sufficient evidenc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pecial punctuation marks seen in the existing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punctuation marks seen in the existing Japanese Kundoku manuscripts in the Edo period to provide new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nbun-Kundoku and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to support that it reflects the great role that China's excellent ancient cultural heritage has play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processes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Keywords: Kanbun-Kundoku; cultural heritage; Dunhuang; symbolism

Author's Information:

Zhao Yiwei (Male) Year of Birth: 1984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Japanese Culture

E-mail: zhaoyiwei@njust.edu.cn